

# 目 录 ·MULU·

学术论丛

XUE SHU LUN CONG

SHAN XI SHENG SHE

HUI KE XUE JIE

LIAN HE HUI

(双月版)

二〇一三第6期·(总第一百三十八期)

- 
- 只有凝聚中国力量才能实现中国梦 王 卫 (封二)
-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·**
- 用史诗铸就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辉煌史诗  
——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王志超 / 2
- 毛泽东的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 李翔德 / 14
- 光辉的史诗 不朽的词章  
——“毛泽东诗词”赏读札记 孟宏儒 / 20
- 哲学·政治·**
- 对网上舆论环境治理的研究 裴余庆 / 26
- 对群众路线的再认识 柴丽丽 / 30
- 试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江雪铭 / 34
- 构建监督有力的党内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四题 石学峰 / 38
- 人大工作与公民意识培养 潘国红 / 42
- 《弟子规》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 
——兼及当代社会秩序的重构 朱 浩 韩贤强 / 47
-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现象研究 刘东杰 / 53
- 对推动贸促会出证认证服务转型升级的几点认识 李菊克 牛建国 / 58
- 历史文化·**
- 宋代武将研究的杰作  
——《攀龙附凤: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》 李裕民 / 60
- 玛丽莎·梦露的性感特征及其建构  
——以《游龙戏凤》为例 张隽隽 / 65
- 从实践沃土中催生的理念新亮点  
——文振西理论与实践相生相融成果评介 王长远 / 69
- 文化强国战略下的青岛蓝色文化遗产研究 梁晓宇 任成金 / 73
- 美国八十年代的媒体垄断  
——读贝戈蒂克安《媒体垄断》 温雨昕 / 79
- 

XUESHULUNCONG ©

## 宋代武将研究的杰作

### ——《攀龙附凤：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》

李裕民

何冠环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宋朝武将研究，出版过《北宋武将研究》的论文集。最近，又推出一部专著：《攀龙附凤——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》（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5月），全书分五章，以李处耘（920—966）、李继隆（950—1005）、李继和（963—1008）、李昭亮（993—1063）一家三代四人为中心展开。李处耘是潞州上党（今山西长治市）人，宋朝的开国元勋，女为宋太宗皇后，其家世代将门，故称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。拜读以后，我认为，此书堪称当前最好水平的宋代武将研究的杰作。

一、它可以唤起史学界对宋代武将研究的重视

武将，是宋史研究领域中最冷僻的园地，除了岳飞之外，其它武将只有星星点点的成果，引不起众人的关注。至于武将家族、外戚将门，更乏人研究。

为什么武将园地那么冷冷清清？原因主要有三。

一、资料相当少，又散见于各个角落，收集不易，武将一般都没有著作，很难写成象样的论着。

二、宋朝虽称一统天下，但其疆域前不及秦、汉、隋、唐，后不如元、明、清。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受外国侵略者的欺负，人们怀念武功极盛的汉、唐时代，研究者众多，赞美之声不绝于耳，而武功不竞的宋则被无情贬斥。

三、现在学者多提倡问题史学，觉得人物不算问题，因而不想染指。

由于上述原因，研究宋代武将者少而又少，而研究者又往往跟着谴责宋朝“重文轻武”，视之为国弱之根源。宋代真是那么“重文轻武”吗？以《宋史》而论，自卷248至卷357北宋的列传中，属文臣者79

卷，属武者30卷，武将占总数近28%。而宋史研究的成果中，武将的比例可能还不到1%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当前的研究者远比宋代更“重文轻武”。如果说宋朝“重文轻武”不对，我们更加过分的“重文轻武”，难道不该纠正吗？

关于资料少的问题，就得靠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的精神去解决，潞州李氏四名武将在《宋史》中仅有7000余字的记载，何先生在收集资料上，可谓下足了工夫，除大部头的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全宋文》、《宋会要》而外，旁及各种古籍、石刻、图录等，还专程赴洛阳寻访李昭亮神道碑，又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画“北寨宴射”中找出李继隆图像，今人的论着，包括未出版的研究生论文都在参考之列，最终推出了四十来万字的煌煌巨著，实在令人惊叹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，由于近百年来，中国饱受列强欺负，过去学者们借着谴责宋朝，讽刺政府的无能，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。而现在国力已经强大，不再受列强欺负，完全可以客观地研究宋朝历史了。但是，百年来谴责、贬低宋朝的影响依然存在，以致未能客观给予评价。人们常常以能否开拓、扩张这一杆秤去衡量宋代的武将。有人认为李继隆是“庸碌之徒”（陈峰《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》，《河北学刊》2002年2期），但未作具体的论证。何先生用了十多万字的篇幅，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，肯定他是当之无愧的名将。应该说，这一结论是恰当的。宋辽之战，在客观条件上，宋就差一些，在冷兵器时代，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骑兵，宋代只拥有农耕区，缺乏马匹，尤其是好马，在实力上比辽差一头。加之宋太宗

缺乏实战经验,却自以为是,好为人师,每次战前,都要画好战阵图,让将领照办,因此常吃败仗。李继隆则不然,他敢于多次违令,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,灵活运用战略战术,取得了满城之战、唐河之战的胜利。当然,他也有过失,尤其君子馆一役,只顾保存自己实力,没有赴援,而使刘廷让全军覆没。但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,表现出色,真宗时,辽军大举南下,他应战有方,使得辽不得不与宋签定澶渊之盟,使辽宋之间保持了一百年的和平局面。

说到澶渊之盟,过去多着眼于寇准力主真宗亲征上。然而,战争从来是双方实力的较量,皇帝出场对宋方士气是个鼓舞,对辽而言,并不构成什么新的威胁,或者说它不会增加胜利的砝码。如果宋方应敌无方而打输了,寇准再能干,结局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。何着对李继隆在澶渊之战中的作用,作了十分有力的论证。指出“李继隆高明的地方,就是因时、因地制宜,布置了一套独特的车营防御系统,将精锐的守军集结澶州北城外的北寨,背城结营防守,并伺机反击。”“他却以守为攻,巧妙地结成步骑居中,环以车垒的车阵,建立守城第一度可反守为攻的防线,另配备射程远的伏弩,随时给敌军致命的突击。”(第227页)经过何的总结,这位名将的形象就突现出来了,使读者对澶渊之盟有了全方位的了解。这是何文的贡献。至于何书中称李继隆“功比卫霍”,我觉得有点偏高了。汉朝客观条件比宋为优,因而卫、霍能够主动出击,开疆拓土,无往不胜,使敌人难以招架,更无还手之力。宋朝基本上只有防守之力,不可能再现卫、霍的赫赫战功,能够守住国土就是很不错的成绩了。宋廷诏书中的过奖之词,似难视为定论。

总之,宋朝军力固然不如汉、唐强大,但在经济、科学、文化上的贡献远高于汉、唐,整体国民素质高于汉、唐,而这一切,必须有一个前提,就是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,没有武将守住国土,能有这样的环境吗?武将的主要功能应是保卫国土,面对实力比自己强大的对手,能够有效地守住国土,就应该充分肯定。

## 二、它有助于解决宋朝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

在注重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看来,人物与问题是两回事,因而不予重视。我觉得需分清人物传与人物研究的区别。前者是描述性的,后者是研究性的。

何着属于后者,作者带着问题去研究,时时在解决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从问题角度去读它,就会有許多新的收获和启发。我读本书的最大收获,就是对若干重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下面举四事为例。

第一、谁是陈桥兵变的策划人?陈桥兵变、赵匡胤黄袍加身之事,众所熟知,然而从周世宗死到兵变,长达半年,这期间,赵等到底是如何策划,如何操作的,其内幕究竟如何,从来没有明确的记载。我曾对此作了探讨,发表《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》(《山西大学学报》,1991年1期),重点在回答上述问题,对幕后谋划人到底是谁,只笼统归之于赵普等谋士,没有深究。我注意到了《长编》所开列的两份加封开国功臣名单:一份是石守信等6将领,一份是赵普等5幕府谋士。中间并没有李处耘,因而对他的作用忽略了。何先生在本书第一章“从龙功臣李处耘”中,揭示了下列4份记载,使我认识到策划陈桥兵变的关键人物是李处耘,而非赵普等人。

《宋史》卷257《李处耘传》:会太祖出征,驻军陈桥,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,遽白太宗,与王彦升谋。召马仁瑀、李汉超等定议,始入白太祖,太祖拒之。俄而诸军大噪,入驛门,太祖不能却,处耘临机决事,谋无不中,太祖嘉之,授客省使、兼枢密承旨、右卫将军。

《李继隆墓志铭》:“考讳处耘,国初佐命功居第一。”

《李昭亮墓志》:“太祖以征伐定天下,(处耘)为建隆元功之首。”

胡旦建议为“功臣李处耘等三人”立传,将他列为功臣之首。

不可否认,赵普确实老谋深算,在鼓动赵匡胤发动政变,建立新王朝,并筹划新班子,适度利用旧班子,实施收买人心、军心的政策以及建国后如何防弊等等方面,出了大力,应予充分肯定。然而其中关键的一幕:策划陈桥兵变,则是一场极其冒险的军事政变,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,需要团结最可靠的将领,制定最周密的计划,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,分工合作,对其它将领,分别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拉拢、分化瓦解、孤立打击等等,政变的时间,谁带哪支部队,走向路线,城内由谁接应等等。这必须熟悉诸将、平时和他们经常接触沟通、身体力行的武人,方能完成。在赵匡胤的幕府中,智囊不少,但能胜任这一任

务的只有李处耘。他精于射箭,有战斗经验,又曾在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老大李继勋(916—977)幕下干过几年。后到赵匡胤手下任都押衙。他年龄比赵匡胤大七岁;陈桥兵变时四十一岁,正年富力强,经验丰富。由于他的出色表现,使陈桥兵变圆满收场。

第二,赵匡胤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智囊团,以往人们都注意到是他们帮助赵发动政变、取得天下,又是他们帮助赵治理天下,却很少注意到建国后集团内部存在复杂而隐蔽的矛盾。

何先生注意到第一助手赵普和第二助手李处耘之间的矛盾。李处耘在宋建国不久,就当上了枢密副使,但不到一年就突然失势?这究竟是因为什么?史书上说,他与大将慕容延钊有矛盾,太祖袒护延钊,将他贬官。何着提出了新的看法,认为另有一个重要原因,是时任枢密使的赵普在背后捣鬼,史称赵普“多忌克”,“李处耘文武双全,又得太祖宠信,若再立大功,谁能保证他有一天不会取赵普而代之?故此赵普要尽早撵走李处耘,改荐他可以驾驭的人做他的副手,这是他专权固宠的必要手段。”有的学者对赵普“多忌克”的说法有保留,何另举排挤宴仪为例,证明史书之说正确。

我仔细看了有关材料,何的结论完全站得住脚。李与慕容矛盾之事,是非曲直很清楚,李是对的,那么为什么太祖要偏袒慕容而贬李呢?慕容是宿将,太祖曾兄事之,关系不错,但慕容并非义社十兄弟中人,陈桥兵变前,太祖命他作先锋,带兵北上,并没有让他参与兵变,可见对他保持一点距离的,事后虽然进封他为都点检,但第二年很快就免去这一头衔,解除其军职。而李则不然,他是太祖的心腹,兵变的主要策划者,建立新王朝的大功臣。在太祖的天平上,李这一头应该略重一点,至少两者一样重,没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起作用,是不可能将李轻易割舍掉的。太祖周围,最具影响力的只有赵普,最想排挤李的也只有赵普。从赵普后来的表现看,他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,一切影响他长期独揽大权的因素,他都会毫不留情的排除。如果不把李排挤走,赵普一旦升为宰相,李就会升任枢密使,赵长于文而短于武,李则文武兼长,随时有可能取代赵普为相,这对梦想长期执掌大权的赵普来说是最大的威胁。将李排挤走,为亲家吴廷祚接班腾出位子,对赵普而言这是最佳

选择。《宋史》既称赵普“多忌克”,则他所排挤的人绝对不止宴、李二例。我的初步观察,还可能包括刘熙古与楚昭辅。建国初加封幕府中人,排在第一位的刘熙古(903—976)为左谏议大夫,第二位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。按次序升格,刘熙古是最可能第一个升宰相的,然而刘却不断被派到京城以外的黄州、晋州、凤翔等地作官,他被很自然的错过升迁机会,直到70岁年老体衰时才升为参知政事,第二年便退休了。(《宋史》卷263《刘熙古传》,《长编》卷5)楚昭辅(911—979),“事太祖,隶麾下,以才干称,甚信任之。”陈桥兵变时,太祖怕母亲担忧,特派他去安慰。这样备受信任的人,在赵普作相时,一直未能进入高层;直到建国13年后即开宝六年(973)八月赵普被免相,九月,赵普的对头卢多逊升为参知政事,与此同时,楚昭辅才升为枢密副使(《宋史》卷257《楚昭辅传》、《宰辅表》卷210,《长编》卷14),这恐怕并非偶然。

大概到罢去赵普相位之后,太祖才意识到在处理李处耘的问题上,上了赵普的当了。只是作为皇帝,碍于面子,不可能轻易认错,但他可以改错,因而在开宝八年(975),特意将李处耘次女许配给太宗。

第三、“祖宗之法”是宋史研究中的难题,宋人经常强调,但没有人给它下定义,现在的研究者也难以下一个定义。这是一时难以弄清却又绕不开的问题。我的初步看法是,它由立国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做法两部分组成,基本精神就是“防弊”,历史上一切影响政权稳定的不利因素都要排除,如唐代的武则天改朝换代、外戚、宦官专权,唐末五代的武将专权、军阀割据,五代皇族的内斗、抢班夺权,为此制订一系列防弊措施,限制后妃、外戚、宦官、武将专权,不许皇族作官,加强监督机制等。就其效果而言,确实没有重蹈上述几类人专权误国的覆辙。这样,很容易给人印象,既然是祖宗之法,每个皇帝都会按一个模式去做。如果细心读何先生大作,就会发现这一认识并不正确,每个皇帝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的,正因为如此,才使祖宗之法变得扑朔迷离,不易把握。

就任用外戚武将而言,太祖没有特别重用外戚将领,而太宗就不同。他上台后,面临着如何驾驭两类武将的任务:一是“太祖手下一大批宿将”,二是“北汉及各地招来的劲兵猛将”。要一统天下以及收

复幽云十六州,离不开他们,而他们的年龄、资历、能力往往强过太宗,太宗为了驾驭他们,只能选择重用外戚的手段,由于需要量太大,把“他的母族、妻族、姐妹的夫族和其女儿的夫族。”(第99页)统统用上了,至少有数十名。“用他的外戚带兵出征,戍守地方及监察将领。”(第98页)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,对李继隆而言是大好事,使他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,成为青史留名的大将。但副作用极大,因为大部分外戚将领的素质不高,“为此,太宗后来付出沉重的代价。”许多败仗,包括名将杨业之死,均与此举有关。

真宗对外戚的态度与其父不同,这是因为太宗李皇后反对他继位,所以真宗一上台就把李继隆等人甩在一边。只是到了辽兵南下国家处于危急的关键时刻,才起用这位名将。仁宗亲政后,重用外戚,表面看似又返回到太宗时期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,有一段时间,马帅、步帅、殿虞和同知枢密院事都由外戚出任,(第320页)几乎把军权都交给了外戚,李家的李昭亮成了这一做法的获益者。但何先生注意到,这不是简单的重复,仁宗与太宗的处境与目的都有所不同,仁宗面临西夏的武力威胁,而此时文臣集团几乎完全掌控朝廷大权,武功不竞会影响国境安定,因而大力提拔外戚武将,使文武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。这反映仁宗掌握了高明的平衡术,对这一点,有些研究仁宗的学者是不曾注意到的。

应该指出,尽管各位皇帝在如何对待外戚武将上做法很不相同,但都没有出现如唐五代时的外戚武将专权的局面,这与祖宗之法中建立的强大监督体制有关,虽然过分重用外戚,有其弊病,但并没有影响政权的稳定。大概也因为这一点,人们不太留意皇帝们对外戚武将上的诸多不同。这就是说:祖宗之法不能理解为内容凝固不变的成文法典。为防弊而不重用外戚武将,是为了政权的稳定;适度重用外戚武将,也是为了政权的稳定,其目的是一样的。

第四、宋代的家族,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,发表论着不少,但炒陈饭者多,有新意者少,空泛浮浅者多,细致深入者少,文人家族多,武将家族甚少,外戚家族更罕见。本书,在家族的研究中,可谓异军突起,既有深度,又多新意。

在宋代,旧的门阀世族已退出历史舞台,进入了

激烈竞争的时代,今天是权贵,明天可能沦落为平民,反之,今天是平民,明天也可能成为权贵。新的家族应该采取什么模式?如何延续,如何走向辉煌,如何保持长久繁荣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同样是外戚,同样是武将,有的像流星,闪亮一下就完了,有的就能相对长久。但辉煌的时间很难超过三代。

上党李氏家族给予非常清晰的回答,许多因素可以走向繁荣,又有许多因素让你衰退,但那一种因素都只能起短暂的作用,要想长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,才能越过各种障碍。李处耘通过多年的努力,为开国立下大功,取得高位,应该说,够令人羡慕的了,但转眼间,可以因为一件事,一点内部矛盾,化为乌有。后来出现转机,其女成为太宗皇后,其子李继隆成为被皇帝信赖的禁军首长,立下赫赫战功,但随着真宗的即位,因为皇后卷入到立谁为太子的漩涡,李继隆只能赋闲在家。此时,他坚持一个“忍”字,没有怨言,还叮嘱其弟“行事小心谨慎”(第184页)。他终于熬过这段无聊日子,在国家危难时刻,在庸将挑不起大梁时,他站出来了,力挽狂澜,稳定了政局,李家重新走向辉煌。他死后配享真宗庙堂,获得了武将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。其弟继和不靠父兄的老本,以不断在西疆立新功而升为管军,何先生称其为“克绍箕裘”,甚为确切。

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代李昭亮,论才能、论战功、论知名度,他都比不上乃祖乃父,似乎不值得做专题研究,但从外戚和家族史的角度而言,又是最值得研究的。任何一个名将的后代,不可能保证都具有超人之才,如果不能超越前代,他们应该怎样才能不坠家声呢?我觉得这一篇最难写,而何先生写的却特别精彩,值得读者细细品尝。

一个人幼年生活往往影响一辈子,而有关名人幼年的记载都非常稀少,如果不仔细发掘,仅仅按一般情况推论,那就写不出特点来。按常理,他应该受其父亲影响很深,其实不然,何先生排比材料,发现他与父亲之间很少接触,其父李继隆长期在外地就职,影响他最多的是姑姑李太后和叔叔李继和。太后没有儿子,把他视同己出,4岁就出入宫中,每十天才回家一次。“习知宫中法规,这对他形成后来的谨慎和易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。”(第287页)太后病重时,希望见兄长继隆一面,而继隆为释真宗疑忌,只

在官外送去一张名笺,是昭亮代父入宫侍候。太后死后,继隆才参加葬礼。随后上澶州前线应敌。真宗北征时,命12岁的昭亮去军中了解继隆的御敌方略和军阵状况;他“还奏称旨”,真宗说:“此儿异日属重任。”相信他的汇报都是其父一字一句教的,这一番阅历对他后来的军旅生涯肯定甚有裨益。真宗死后,仁宗继位,刘太后垂帘听政,太后重用外戚,昭亮开始脱颖而出。太后在后期越来越专权,自然会引起已成人的仁宗等人的不满。昭亮明知可以获得太后更大的宠幸时,却选择离开朝廷,到外地为将,虽然辛苦一些,但一来可以取得作边将的经验,二来可以躲开矛盾。果然,过了几年太后去世,仁宗亲政,清洗太后近臣,昭亮不仅躲过一劫,还获得仁宗重用。以后,政治风云多变,他都能安然度过,而且节节上升,直至军阶最高的殿帅。这些经历,详见何着,此不赘述。同是外戚,结果大不相同,有辉煌一阵即败落者,也有延续上百年者,这需要深入研究每个外戚所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,才能得到确解。

### 三、对研究山西地方史有其独特的意义

宋代皇帝在对待山西的武将和百姓方面颇多不良记录。宋太祖一建国,便率先剿灭忠于后周的泽潞武将李筠集团。太宗灭北汉,一口气将随同刘继元降宋的数百名武将处死。降将杨业为保卫宋边境作出巨大的贡献,却被奸臣陷害而战死。另一名将陈延山被谗言所害,被逼反抗,终被处死。汾州人狄青屡立战功,升任枢密使,不久,即被外放,含恨而死。宋在灭北汉过程中,多次将百姓强制迁到千里之外,又以火烧、水淹晋阳城,还不许百姓回乡居住、开垦。这一切在山西人心中留下了恶劣的印象,代代相传。有一次,我观看一部传统的晋剧,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:宋代皇帝居然对臣民下跪、承认犯了错误。我真的惊呆了,全国有数不清的剧种,有哪一个剧敢让皇帝下跪呢?恐怕连想象力最丰富的剧作家也想不到吧!晋剧中的场面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但是,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的例子远非历史的全貌,事实上,宋朝皇帝并没有对河东武将有特殊的偏见。何先生的大作,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场景:潞州上党李氏家族就受到宋帝的宠信,在历史舞台上风光过百年。也为山西地方史的全面深入研究,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。

最后,按照我写评论的习惯,找一下瑕疵。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,本书也不可能没有缺点,但要挑本书的毛病,实在不容易,何先生在史料上下的工夫很深,收集资料丰富,想找一条他未曾使用的材料,很难找见。他不发空论,言必有据,对资料进均作细致的考证,所有跟论点有关的考证,都站得住脚。目前只能找见两点无关大局的小毛病。

一、本书凡提及到的人物,都尽可能注明其生卒年,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,但个别地方有点问题,如钱惟远的生卒年,第293页为977—1034,第397页则为962—1034,两者相差15年。

二、李昭亮碑的书写人王璠,本书第285页注5:“王璠,洛阳人,咸平初为画院待诏。”按:其署名为“群牧判官、文德郎、守尚书门下员外郎、充集贤校理、上骑都尉、赐非(按当作非)鱼袋臣王璠奉敕书”。考北宋有三位同姓名的王璠。其一、北宋初人,字国器,河南洛阳人,“乾德、开宝之间”的著名画师。画家武宗元(?—1050)感叹“恨不同时,亲受其法”。(刘道醇《宋朝名画评》卷1)可见乃武宗元以前人。而宗元之父与王随(973—1039)为布衣交,宗元娶王随外甥女为妻,王随已比王璠晚一辈,宗元更晚。这位字国器的洛阳人王璠,不可能为晚于自己八九十年的李昭亮(993—1063)写碑文。

其二、王璠字符圭,鄞县人,该之子。元丰五年(1082)进士。(宝庆《四明志》卷10)其年辈太晚,与碑文不符。

其三、王璠字文玉,华阳人,宰相王珪(1019—1085)之兄(米芾《书史》:《陆柬之十八学士赞》,西京留台王璠云:在舍弟珪处。)景祐五年(1038)与司马光同榜进士。(司马光《送王璠同年河南府司录》注:字文玉,先君尝为此官。《传家集》卷13)熙宁二年前已任集贤校理(苏颂《三司度支判官、尚书刑部郎中、充集贤校理王璠可尚书兵部郎中、依前集贤校理、充三司度支判官》制,《苏魏公文集》卷33)。其年龄、官职均与碑文相符,应即此人。

总之,本书是何冠环先生数十年来研究宋史的结晶,是献给读者的一道丰盛的大餐,读者自可根据不同的口味去品尝,相信必有可喜的收益。◆

[作者单位:陕西师范大学·责任编辑:王志超]